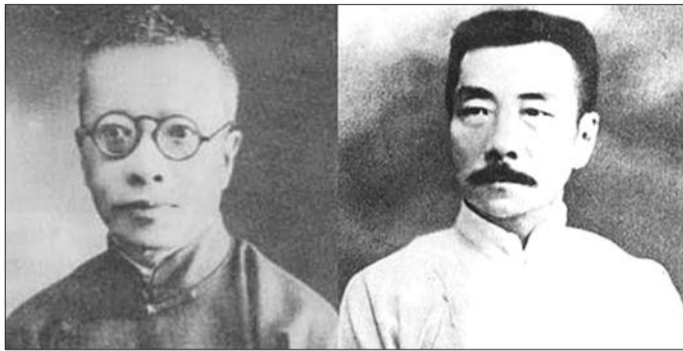


【文坛钩沉】

□傅国涌

在他的眼里,鲁迅有短处,多疑、轻信、迁怒,当然也有长处,有贡献,“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

钱玄同日记中的鲁迅



钱玄同(左)与鲁迅(右)相交多年,最终却渐行渐远。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北平后,长期坚持写日记的老朋友钱玄同正好有两周中断了日记的写作,当10月31日恢复日记时,他只补记了“周豫才死”一事:“我因为青年们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教主,而又因有《世界日报》访员宋某电询吾家,未见我,而杜撰我的谈话,我极不愿,因作《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

他们相识有二十九年,其中1917到1926年间交往甚密,也正是他催生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早期之作。鲁迅当时住在绍兴会馆,业余热衷于抄古碑、辑古书,钱玄同竭力怂恿他给《新青年》写文章,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这在鲁迅《呐喊自序》中也有提及:“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挟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个“金心异”就是钱玄同。那时,他们时有往来,钱玄同日记中留下了一些零星记录。

1917年10月8日晚,他访周氏兄弟,“豫才见《新青年》三卷六号我致适之信内称《留东外史》为时人所撰小说中之第二流,颇不谓然。吾亦知此等称为过情,惟就中国今日之小说论,短中取长,所以如此说法。”五天(13日),他又访周氏兄弟,谈到半夜才回住处。1918年1月2日,他与陈独秀、刘文典聚谈,两人都说中国文化已成僵尸之物,想要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当天他

【学界往事】

□智效民

尽管杨振声与沈从文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最让人肃然起敬的,还是他们在编写中小学生的教材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沈从文是个天分极高的人。他虽然是小学毕业、出身行伍,却在文学创作、大学讲台和考古研究等方面获得很大成就。相比之下,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编教材的经历,却似乎被人遗忘了。

沈从文编教材与杨振声有关。杨振声是胡适的学生,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曾发表在《新潮》、《现代评论》、《新月》、《大公报》和《国闻周报》等刊物上。杨身材高大,学养深厚,性格温和,作风端正。他虽然比胡适年长一岁,但是对老师却非常敬重。我曾经在1947年2月3日的《大公报》上看到一篇题为《杨振声小记》的短文,该文虽然不长,但其中三件趣闻轶事都非常有趣。

一是杨在青岛大学担任校长时,曾经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前来讲演。不料轮船抵达青岛后,因为风浪太大无法靠岸,所以胡适只好发了一封“宛在水中央”的电报。杨接到电报后,立即发了“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回电。所以,该文作者说:“两份电报均有典故,可谓‘用古恰切,酬客至妙’”。

二是杨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父子,不如说是朋友。儿子结婚时,他不以家长自居,而是像普通客人一样前去道贺,令在场嘉宾耳目一新。

三是为了研究儿童教育,杨曾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去当老师。他讲故事绘声绘色,做游戏追逐打闹,没有一点儿“师道尊严”的样子。

此外,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说,1933年冬天,他与唐钺、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讲演。去了以后,东道主似乎要考考几位学者运用“大众语”的水平,便安排他们与小学校和幼稚园的孩子见面。胡适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往往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杨振声字金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第1111页)。难怪那位作者会感慨地说:与杨振声在一起,许多人都有一

在日记中说,“此说与豫才所主张相同,吾亦甚然之。”这是他们之间的共识。1919年1月7日,他和刘半农同访周氏兄弟,“豫才说:如其大东海国大皇帝竟下了吃孔教的上谕,我们惟有逃入耶稣教之一法。豫才主张用耶稣教来排除中国旧儒。我本来是不赞成的,但彼等若竟要大家吃孔教来研究那狗屁的‘三纲五常’,则我们为自卫计,惟有此法而已。颂平说:他入耶稣教全为反对丧礼,这是和豫才一样的意思。”“大东海国大皇帝”即为大总统徐世昌,倡“孔教”之说对他们的刺激由此可见,当然,“孔教”最终没有变成现实,他们也没有接受基督教信仰。1923年8月24日,“鲁迅送我一本书《呐喊》。”27日,“看鲁迅的《阿Q正传》。”他日记中开始不称“豫才”,而叫“鲁迅”。1925年3月22日,“晤黎邵西,他说日前遇鲁迅,谓汉字革命之提倡实有必要。他主张别读中国书,是同样的意思。纵使过高,亦是讨价还价也。此说甚多。”在鲁迅日记中,他们交往的记录更多,只是鲁迅日记太简略了,从未记录他们谈话的内容。

自1926年鲁迅南下之后,直到1929

年5月25日他们在北平孔德学校见过一次,他看见鲁迅的名片还是印着“周树人”三个字,笑问了一句:“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鲁迅反唇相讥:“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因他曾自称“疑古玄同”。当夜,鲁迅写信给许广平说起这次相遇,称他“胖瘦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1933年,《两地书》出版,虽然将“钱玄同”改成了“金立因”,他看到了,心中的不快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对鲁迅的看法,显然不是因为这次不愉快才改变的。这些年,他一直留意老朋友新出的作品,而私下的评价越来越负面了。1932年11月7日,他买了鲁迅的《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闲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1935年1月12日,他在东安市场购得新出版的鲁迅的《准风月谈》,当天日记说:“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难怪当鲁迅去世时,他不满有些青年“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教主”,在他的眼里,鲁迅有短处,多疑、轻信、迁怒,当然也有长处、有贡献,“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述论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他们相交多年,最终渐行渐远,而他对鲁迅最后的公开评价大致上还是有节制的持平之语,并不都像日记中那么直截了当。

(本文作者为近代史研究学者)

沈从文为什么要编教材



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

种“自惭鄙吝,若鸡凤之相比”的感觉。

1930年,杨振声在蔡元培和胡适的推荐下,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后,邀请沈从文和闻一多、梁实秋、张道藩、黄敬思、赵大侗、方令孺、梁启勋等人前来任教。后来,杨振声不愿与韩复榘应酬,便辞去校长职务返回北平,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承担了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

杨振声辞职后,沈从文也来到北平参加编写教材的工作。当时他与张兆和订婚不久,因为生活所迫,曾经把结婚戒指典当出去。据张兆和女士回忆,杨先生知道这件事以后,不仅马上给沈从文预付了50元薪水,还以兄长的口吻责备道:“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张兆和是张兆和的妹妹,她的说法应该没错。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振声和沈从文逃离北平来到武汉,住在珞珈山下的一个小独院里。当时萧乾被《大公报》解聘流落到此,于是杨先生便把他收留下来。因为萧乾没有编制,所以杨先生每个月都要自掏腰包给他支付50元薪水。

西南联大成立以后,杨振声担任叙永分校主任,沈从文也应聘前来执

教,并继续与杨振声一起编写教材。据张兆和回忆:当时的工作地点是青云街6号,参与这一工作的还有朱自清、张兆和、汪和宗三人。杨振声比较忙,不经常来,朱自清每周来一两次。他们的分工是沈从文选编小说,朱自清选编散文,张兆和选编散曲并做注释,汪和宗负责抄写工作。

我曾经有这样的疑问:杨振声、沈从文和朱自清既是著名学者,又是第一流的作家,他们在教书之余,为什么要编中小学教材呢?后来才明白,他们之所以这样,除了对教育事业的深刻理解之外,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自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就有一股以反对“全盘西化”为由,全面否定白话文运动的逆流。有人甚至提出要用文言文作为小学教材,以便开历史的倒车。这就是杨振声和沈从文为什么要在北平编中小学教材的主要原因。

尽管杨振声与沈从文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最让人肃然起敬的,还是他们在编写中小学生的教材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袍与牢骚》等书)

济南以南的泰山山脉是上帝的杰作,人类研读参悟了几千年才对其精妙略知一二,这略知的一二就让人感动和崇拜得一塌糊涂,千里之外的天子要来封禅,几百里之外的小脚老太太要来许愿还愿。不过,天子和小脚老太太对泰山的崇拜未免有些功利,以此我们可以看出,上帝原创的自然和人类邯郸学步创造的城市有着天壤之别,上帝创造的泰山是天创世作,而人创造的济南不过是某种工艺造型,济南这样的工艺品可以批量生产,而泰山则无法复制。

用人的一生去解读泰山都太短暂了,况且过于年少和过于年老都不适合走进她的怀抱,而青壮年和中年又心气浮躁,无法领会泰山的精华所在。更多的人把泰山当成济南的后花园,这也无可厚非,人在城里呆得久了,势必留恋山水自然。城里的污浊空气、噪声、拥堵已让

【舜天鲁地】

济南以南(下)

□李亦

人急切地想逃离,只是真要让城里人留在山里却有许多问题。城里人已经训练出了逃避和窜鼠一样迅速跳动的心,用快节奏和高效率衡量一切事务,而读山阅水最用不得效率;城里人还习惯集约化和制式统一,这要比早年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走得更远,“世界通用”是一个标准,而大山最没有制式和标准,人类测量的海拔也只显示了它的高度。

未定居济南前,曾多次乘火车穿越济南至泰安之间的大山。这条线路差不多就是泰山西沿,从济南南行,山形地势一路高升,百峰千谷各有姿态,苍苍无际的景致渐渐变得青幽凝重,大山越近主峰越显苍劲。坐在车里,心无缘由地坚定起来,那坚定似乎没有指向,没有目标。定居济南后,走东线103省道穿越泰山的次数多起来。车过仲官,公路就在山谷里环绕,四野尽是山崖壁壑,浅黛色山岩从眼前层层铺开,朝远处铺成一线山脊。回望济南,早被山挡树遮,济南已成某种隐喻,成了泰山非常肤浅的注解。山野画境将我层层包裹,无法抑制的吟哦冲动撞击心胸,不思量就脱口诵出北宋诗人梅尧臣的诗句:“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难以抗拒来自城内的吸引,年龄越长,济南以南的引力越大,我流连山野,漫步松柏乱石中,行止于溪畔险峰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小雅)。山道起伏,人动山移,梅尧臣的《鲁山山行》又涌到嘴边: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
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独行山野密林,迷路是一种境界,忘记来时的路,才能随处发现好风景。闻鸡鸣,知道附近有村落。村子人家不多,房子大都建在依山环绕的溪畔,几个老人见有生人进村,都扭头看过来,走近时老人竟站起来让座,见我拿了水杯,又邀我去家里喝茶。这家院落很空,倒也干净。老人找茶壶打算泡茶,被我劝阻,老人讪讪一笑,提起暖瓶注满我的水杯。老人问我打哪里来。我说从济南来。老人说,济南没有这里安稳,在儿子家住几回都不习惯。我说我也不大习惯在济南住了。老人很认真地说,家里闲房不少,你要想来就来。我问他村子叫什么,老人说叫小南营。我问:过去村里住过队伍吧?老人难掩惊喜,轻拍桌面说,一看你就是个读书人,住过李世民的队伍,所以才叫小南营,北面的西营也住过。李世民称赞这里水好,临走栽下槐树,说还要回来浇水。我喝一口小南营的水,果然有种说不出的爽快。我问他:李世民回来过吗?他说:人家有这个心意就了不得。

那一次因误了回济南的班车,真的住在了这位老人的家里。从老人嘴里,我知道了小南营与济南的差别,小南营人有信仰,他们的信仰就是泰山。泰山让他们远离纷扰、平和淡然。

济南人把泰山看成后花园有些肤浅,也有些轻飘。在大山深处,多汁水翠的植被确能扫除市井生活的尘霾和疲惫,而真正让人笃定的还是植被下面的岩石,它是从地心长出的千年万年不变的大树,它的姿势就是它的信念,它的无语就是它的宣言,在它怀抱里,人才能褪去异化,回归成真正的人、纯粹的人。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本名李传敬,代表作有《药铺林》、《双凤门》等)